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二編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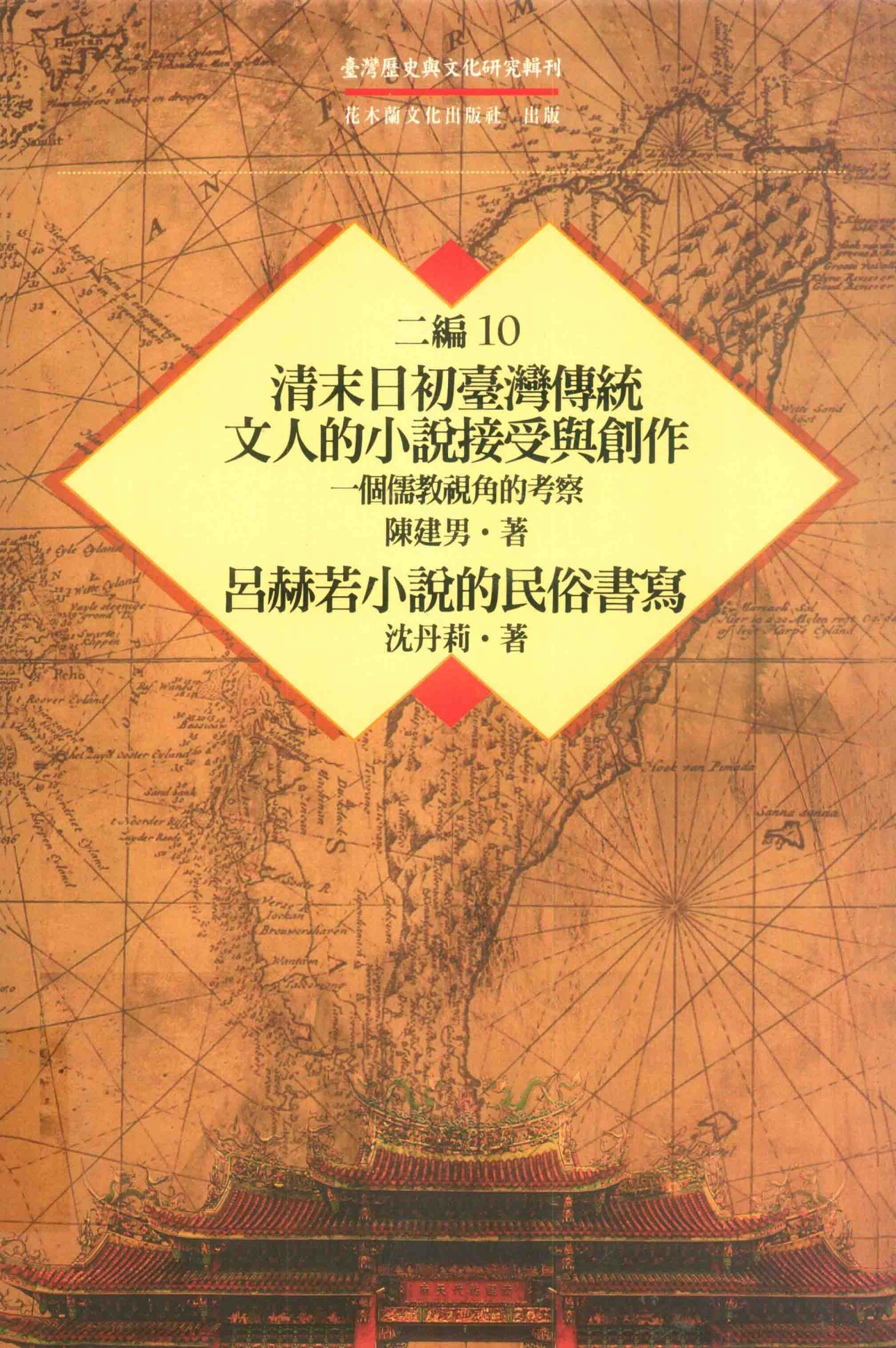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臺灣傳統 文人的小說接受與創作

一個儒教視角的考察

陳建男・著

呂赫若小說的民俗書寫

沈丹莉・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二 編

第 10 冊

清末日初臺灣傳統文人的小說接受與創作
——一個儒教視角的考察

陳 建 男 著

呂赫若小說的民俗書寫

沈 丹 莉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末日初臺灣傳統文人的小說接受與創作——一個儒教視角的考察 陳建男 著／呂赫若小說的民俗書寫 沈丹莉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116 面／目 2+116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編：第 10 冊）

ISBN：978-986-322-234-7（精裝）

1. 臺灣小說 2. 文學評論

733.08

102002847

ISBN-978-986-322-234-7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編 第 十 冊

ISBN：978-986-322-234-7

清末日初臺灣傳統文人的小說接受與創作
——一個儒教視角的考察

呂赫若小說的民俗書寫

作 者 陳建男／沈丹莉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28 冊（精裝）新臺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陳建男，臺灣屏東縣人，畢業於國立臺東師範學院語教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目前任職於新北市淡水區育英國小，努力學習成為一位好老師中。

提 要

此篇論文主要透過清末民初文人士紳的小說接受和創作情形，來釐析儒教價值觀與近代臺灣小說的關係。主論分有三章，分別從社會文化條件、文人士紳的地方教化實踐，以及日本殖民者的儒教移植三個面向切入探討。

在首章 移墾儒教社會的小說形塑，筆者主要探討清代臺灣移墾的社會風尚與儒教文化意識對小說發展的影響，並具體考察小說的移墾社會傳播形態。

在次章 文人士紳的「在地性」與小說接受，主要透過考察文人士紳的地方教化權力和實踐與其小說接受之關係，來探討儒教價值對小說發展的影響。筆者首先探述士紳的地方性內涵及文教活動，再進一步考察士紳的小說接受心理以及閱讀情形，以檢視體現在士紳地方教化活動的儒教價值對小說的影響。

在終章 殖民儒教的移植與近代臺灣報刊小說的發生，主要透過傳統文人對時局的肆應，以記者的身分進行報刊小說之創作，來探討在殖民者天皇國體儒教價值的移植和漢文文化統合的背景下，近代臺灣報刊小說的發生內涵。

藉由文人士紳的傳統小說接受與近代報刊小說創作作為探究主題，對於臺灣小說起源的整體性，我們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臺灣小說乃是從移墾儒教社會孕育而生，儒教重道德教化、勸善懲惡的文學價值觀念，強烈影響、制約著小說的發展。這一印跡，乃透過清末和日治初期文人士紳的小說接受，以及肆應時局變動下的報刊小說創作所顯現出來。然則，在教化價值之下，亦隱含著文人士紳對小說藝術性的娛情感動，文人士紳對「非正統」的通俗小說這一複雜心理，正適足代表了儒教社會小說存在和發展的曲折形態。

謝 辭

不知道算不算晚？但終究還是來到了撰寫「謝辭」的時刻。這篇論文的完成，得諸於許多人的幫忙和祝福。感謝我樸實的雙親，是您們給我堅定而篤實的台灣意識和認同，讓我在成年之後能夠朝更深的「台灣」——我們自己，探尋；感謝您們雖然說得不多，但總是默默而滿滿地支持我、相信我可以完成；兒子要將這篇論文謹獻給您們！

感謝與我愛情長跑十幾年、小腹終於隆起的牽手。謝謝妳長久以來陪在我身旁，也總是默默的信任我、支持我，照料生活。如今論文完成，角色也可以互換了，由我來照料妳，以及日漸在妳肚子裡長大的我們的孩子。

感謝俊雅老師。老師不但耐心等待我回歸論文的撰寫、給予我肯定，更為學生論文的刊載奔波、擔憂，並在論文的修改上給予諸多珍貴的研究建議。除此之外，老師認真而嚴謹的學術態度是學生寫作論文的精神典範，閱讀老師的著作，常讓我抱持學習的心態，嚴謹地撰寫論文。這篇論文若沒有俊雅老師您，是千萬無法產生的，謝謝您。

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向陽老師、淑慧老師，謝謝您們對學生論文的肯定，並且在理論、邏輯、史料上都給予寶貴的意見，讓學生對自己的論文有更為清晰的理解。感謝師大台文所的師長、同學、學長姐、學弟妹，雖然投入在所務的時間不長，但與您們的相聚卻都讓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記憶——有幸受教的曹永和院士、萬壽老師、榮松老師、勤岸老師、芳玫老師、安娟老師、淑慧老師，以及尊敬的筱峰老師、親切如友的地理系聖欽老師；此外，要特別感謝鼓勵我甚深的振富老師，您對學生的熱誠和鼓勵，一直是學生不忘前進的動力，謝謝您。

感謝兩年有緣和睦的同學們，南衡大哥、順明大哥，還有同為文學組的雅菁、薰文、碩佳，希望已畢業的你們都過得很好。還有毓凌助教、孟珈學姐，謝謝妳們在畢業在即的關頭，熱心地給予我意見和幫助。

感謝大公無私的淡大圖書館，能夠收容如流浪漢的我自由穿梭書林之間，並提供所需的知識參考和源源不絕的「勁量」電能。最後，感謝一下陳建男，謝謝你的堅持沒有放棄。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說明	5
第二章 移墾儒教社會的小說形塑	9
第一節 移墾社會性格對小說發展的影響	9
一、重利豪奢風氣的形成	9
二、重利豪奢的風氣導致文教發展的遲緩	11
三、重利的社會風氣促進小說通俗意識的流動	12
第二節 儒教意識對小說發展的影響	14
一、通俗小說在儒教網絡的位置	14
二、合流於民間宗教的教化特色	15
三、儒教價值觀對小說發展的制約	18
第三節 移墾社會小說的兩種傳播形態	19
一、書面小說的傳播形態考察	19
二、非書面的小說通俗意識流動	27
第三章 文人士紳的「在地性」與小說接受內涵	31
第一節 士紳的地方教化實踐	32

一、在地性——士紳教化權力的獲得與實踐	32
二、士紳地方文教事業的參與	34
第二節 文人士紳的小說接受心理	40
一、娛情	40
二、教化	44
第三節 文人士紳小說接受內涵之考察	45
一、以張麗俊、黃旺成、賴和為對象的小說閱讀考察	46
二、文人士紳小說接受的內涵分析	49
三、傳統「講說」——教化與小說通俗意識共同的傳播形式	58
第四章 殖民儒教的移植與近代台灣報刊小說的發生	61
第一節 日治初期殖民者的儒教移植	61
一、明治儒教的復起與內涵特徵	62
二、明治儒教的殖民地移植	66
第二節 文人士紳對殖民儒教的肆應	77
一、文人士紳的「在地性」轉變	78
二、統治者訴諸儒士「經世濟民」、「共進文明」價值的呼籲	80
三、新聞記者——傳統士紳社會、文化資本的近代轉化	83
第三節 近代台灣報刊小說發生之考察	86
一、漢文跨界與交混：黃美娥「古典文學知識新秩序」說的探討	87
二、傳統文人報刊小說創作的考察：語言、文體與儒教意識	94
結 論	107
參考文獻	10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殖民現代性」議題的開展、深化，日治初期傳統文人的漢文書寫，也在「文學現代性」思維下，漸獲學界關注。這一立基於「現代性」意識之研究：諸如黃美娥教授以傳統文人對現代性的感知、領受，重新審視新舊文學之分界〔註1〕；呂淳鈺以「偵探敘事」為探索，「展現彼時台灣對於現代性諸多議題的理解」〔註2〕；或林以衡以報刊之漢文「俠敘事」，探討「台灣通俗文學更充滿多元重層的複雜意涵」〔註3〕，大抵皆與通俗性連結，藉由「通俗／現代性」去挖掘新、舊過渡的「文學轉型」中，更為繁複而多義的台灣小說發展之內涵。接連上三〇、四〇年代《三六九小報》、《風月報》等漢文通俗報刊，以及吳漫沙、徐坤泉、林輝焜、雞籠生、鄭坤五等日治晚期通俗作家之研究，一條以「通俗／現代性」作為意識主軸的小說發展脈絡，儼然成形。

「通俗／現代性」研究主軸的意義，正如陳建忠教授所提到的，在於通俗敘事與台灣現代小說的興起頗為密切：其不僅「關乎文學現代性如何被引

〔註1〕 參見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市：麥田，2004年）。

〔註2〕 參見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92學年度碩論）。

〔註3〕 參見林以衡，〈日治時期台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95學年度碩論）。

進台灣，而形成現代小說的美學與思想形式」，同時「也是『現代文學』此一文學觀念與形式，如何在台灣形成一新文學傳統的『文學起源論』問題」〔註4〕。無疑地，「台灣近代小說起源」的意義性，深化了日治初期漢文小說書寫的探討，而在目前東亞儒學、漢文跨界的文化／文學研究主流下，透過漢文／學的殖民地同文語境之衍義來探析日治初期漢文小說書寫，更成為釐析「小說起源」的新途徑〔註5〕。透過殖民報刊漢文版的中介，日本漢詩和漢文小說作品的進入，刺激了台灣傳統文學場域發生近代的變動；在黃美娥教授的深入研究中，此更甚成為近代台灣小說興起之根源〔註6〕。

殖民語境下的小說「通俗／現代性」研究，因成果的逐步積累而漸獲深入的釐清；然而，這一研究取向仍有其值得再思之處。首先，從通俗的面向探究小說的近代起源，雖是準確的方向，卻也僅止是基本的方向。日治時期以漢文（文言及白話）書寫、以報刊作為載體的小說，其發生、發展的價值驅力，雖主要還是「休閒暨文化娛樂目的」〔註7〕，也就是小說的通俗消遣性本質，但設若我們僅從這一方向考察小說的發展，固然其迎合現代所發生的轉變情形能夠得到闡釋，但更具重要性的小說創作意識和藝術經營上的問題，諸如：文人小說創作的意識為何？真的僅著眼消遣娛樂目的？小說的通俗性是報刊小說興起的主要動力？報刊小說之外的傳統古典小說不是更具通俗性？文人小說創作何以筆記體小說作為起頭？報刊小說的形式何以仍「舊」？傳統古典小說對文人的報刊小說創作是否具有影響？這些小說起源和存在所蘊含的繁複而交雜的政治社會文化內涵，將難以得到適足的顯豁和闡釋。

其次，若從殖民現代性來思索文學起源的問題，認為殖民地文學的現代轉化，乃是對統治者「同文」文學刺激的反應——美學的接受、創作形式內

〔註4〕 參見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等合著，《臺灣小說史論》（台北市：麥田，2007年），頁68。

〔註5〕 茲如黃美娥老師的研究，以及蔡佩玲對謝雪漁漢文書寫的時代內涵之探究（〈「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政大中國文學研究所97學年度碩論）。

〔註6〕 參見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9年9月。

〔註7〕 參見吳福助，《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臺中：文叢閣，2008年4月），出版說明，頁4。

涵的模仿——雖然有助於詮釋小說摻入新文化元素的時代性內涵，但面對小說傳統的一面，卻同樣缺乏確切的解釋。基於此，對於近代台灣小說起源的探究，有從不同的視角加以補充、釐析之必要。

從二〇年代新文學發軔前的小說理解來看。明治三十三年（1900）七月二十七日，梯雲樓主在《台灣日日新報》的「論議」欄上發表了一篇〈論訛言多襲諸小說〉〔註8〕的文章，針對小說傳奇、述異的虛構特性易引起「眾庸」的閒論和盲信提出批評；呼籲大眾對於小說神異的情節應當存有審視其真實性的心理。其言：「試問，古來小說傳神異之事甚多，核之史書曾有一事屬實乎？知小說之傳夫神異概無足憑，則知訛言之仿於小說，亦不足援以為據矣。世之聞異詞者，尚其審諸。」梯雲樓主對小說的批評，頗值得我們留意，一則它表露了當時小說傳奇述異內容的普遍性；二則也呈現出大眾的小說品味；更重要的是，文中有一段難得的、針對小說刻板情節的批評，顯示出應是為文人的梯雲樓主，對小說的深刻理解：

喜述訛言之輩平日之所矜博，洽非能熟稽歷史、特浸淫乎各種小說，而以其設想之言拘泥之為實蹟者也。……若諸小說所傳，則英雄起於草澤、豪傑奮於茅蘆、山林盜賊旋為廊廟之勳臣、閨閣女流頓作疆場之大將。人事當務之端，初不必習之有素且賴遭逢之獨異，突有好事神仙授之奇書、付之寶器，自能出身佐命仗義；興師內、清君側之惡，外折衝乎四鄰，慷慨盡忠，建非常之事業。其言類此，大抵不得志於世者有所感憤，姑假託之以暢其所欲言。……

大正七年（1918），許子文在其〈破除迷信議〉〔註9〕一文中，針對小說易導人於迷信的特點提出反省。他認為：「小說之書，所述迷信者甚多。然既能識字，則文理粗通，必不為其所迷，獨有目不識丁者，閒暇之時，偏好聽小說，且好聽小說之最大迷信者，如封神、西遊……，有志者宜出一提倡，……而以我國古今事實之史蹟，編而為書，刊行於世，……普及地理歷史之觀念。」許子文認為不識字者較容易相信小說怪奇虛構的情節而入於迷信，因此應當改革小說的內容及藉助小說的傳播，來宣傳較具科學和理性的真知識。

到了大正十三年（1924），張梗在《台灣民報》上發表了〈討論舊小說的

〔註8〕 見《台灣日日新報》第671號第三版「論議」欄，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註9〕 參見許子文〈破除迷信議〉，文載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卷一，頁16。

改革問題》〔註 10〕，對「小說」進行了更為全面的審視。張梗的論述主要有二點：

- 1、內容主題上：批評因襲、消遣，指出小說應具有立基於人生和社會的現實性涵意；
- 2、技法佈局上：排斥勸善懲惡的春秋筆法和僵化的情節安排，鼓吹體驗的、重個性描寫的寫實手法；

此外，由張梗在文中提及了：西廂記、聊齋誌異、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三國誌、隋唐演義、七俠五義、七子十三生、彭公案、施公案、粉粧樓、封神演義、走馬春秋、西遊記、兒女英雄、三門街李廣、楊家寡婦平南蠻十八洞、孟麗君、薛仁貴征東征西、樊梨花掛帥、桃花扇、報刊／坊間小說、台南布袋戲齣……等舊小說／戲劇的情形來看，可以看出張梗所指涉的小說對象主要是白話章回小說，包括歷史、神怪、俠義公案、情愛等通俗主題，並沒有特別論及報刊上的文言小說〔註 11〕；而其對小說的批評主要在於小說的內容脫離時代社會生活的現實，且在創作形式上保守襲舊、缺乏因應時代的創新。

藉由上述的舉例，我們可以看到在新文學發軔前，傳統小說仍舊得到較大的關注和反思（因為傳統小說更具通俗性），而以報刊文言形式傳播的近代小說，似乎仍被包納在傳統小說之中述及和理解。讀者對於小說的認識仍依循儒家的小說觀——傳播訛言、導人迷信、固陋襲舊的瑣碎言論，並沒有因為報刊小說所象徵和具有的現代性，而對小說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而雖說報刊小說已然摻進現代文化元素，卻並未在知識分子的「小說啓蒙」思考中受到正視，這顯示出就通俗性來說，報刊小說遠不及傳統小說。而就小說的創作意義上，此或許更代表著報刊文言小說在形式和內容上與早存的傳統古

〔註 10〕 張梗之文共有 7 回。始刊於《台灣民報》2 卷 17 號至 2 卷 23 號，連載時日為 9 月 11 日至 11 月 11 日。

〔註 11〕 張梗未特別針對報刊文言小說提出針砭，可能是因為正處於提倡白話文運動的階段，所以談論的對象主要是那些流傳甚廣的中國白話小說。而張梗提出改革舊小說的原因，應是認為白話小說更易為大眾所接受、具有更廣的傳播性。或許如黃呈聰所想的一樣：「我看我們的社會，從前和現在多數的人，都喜歡看那個紅樓夢、水滸傳等的白話小說，所以已經有普及一部分在社會上，若是將這個擴大做一般民眾的使用就好了。」（〈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刊於《台灣》4：1）。關於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階段劃分和特色，可參考許俊雅老師的著作，《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1999 年），第一章、第二節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頁 52～123。

典小說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以致小說未足以讓知識分子體察到不同的變化。

這一現象讓我們體悟到應當回到文學發生的社會文化場域來思考近代台灣社會整體小說存在的情形，並且關注到並存的傳統小說和報刊小說兩者間可能的關連性。而對於到了二〇年代，小說的整體氛圍仍舊傳統和人們對於小說的理解和品味依舊的疑問，則似乎我們所必須直指探索的，乃是傳統小說賴以存續和維繫的社會條件和文化心理因素。

對於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的氛圍，黃美娥曾指出殖民統治者刻意維繫了一個以傳統舊文學為主的文學社會形態：「來台治理殖民事務的日官，反倒是頗多具有漢學背景，善寫漢詩者，在治理政策的考量下，日本並未貿然強勢引介帝國的近代文學來台，而是刻意沿用漢文、漢詩以與台人交流，如此倒使台灣傳統漢文學的發展不致中輟……」（註12）殖民者如此的漢文／學籠絡、懷柔的文化方針，應當蘊含著殖民者藉以統治和教化殖民大眾的意圖。因此，雖說報刊具有通俗與啓蒙的現代性意義，但卻因殖民者的漢文政策操作，以及舊有社會形態的維繫，而遭到反阻的作用力。那麼，由此思考台灣近代（報刊）小說，我們似乎就不能不考量到其有別於「通俗／現代性」的另面內涵。

綜合上述疑問和原因，筆者嘗試在「通俗／現代性」的研究觀點之外，在社會條件和文化心理的思考下，選擇「儒家教化」作為闡釋台灣近代小說源起的另一觀點，透過探討儒教社會的形塑、士紳地方教化以及殖民者儒教移植這三個主題對小說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來探析台灣近代小說開展之場域。

第二節 研究說明

接續動機敘述，此節筆者想針對「從『儒家教化』視角來考察近代台灣小說場域」這一想法作進一步的說明。這篇論文寫作是以「文學是特定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產物」這樣的思維為起點。「文學」不單只是文字和情感思維藝術的產物，若從中國文學的發展來看，更可見文學與政治始終緊密相連的關係；政治、文教制度的變化，往往牽連著文學發生變易（註13）。關於清代台灣文學的發展與政治社會文化的關係，林淑慧教授的研究已有深入的探

〔註12〕參見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頁70。

〔註13〕可參見前野直彬著、龔寬馨譯，《中國文學的世界》（臺北市：臺灣學生，1989年）。

討和闡釋〔註14〕；閱讀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文學的發生，與時代的政經、社會文化條件緊密相連，這些所謂「外緣」的元素深切影響著台灣文學的萌生與發展，就文學的發生來說，實不應當被排除在「作品」的內涵之外。因此，同樣的，對於近代報刊小說的出現，也應當將之置放在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來考察。

總合這些層面來思維「傳統文學」（或整體「台灣文學」）概念，我們將發現「儒教」〔註15〕——儒家教化的道德價值觀和實踐體系——扮演著最為核心的角色。杜維明（Tu Wei-ming）的「作為東亞生活方式的儒教」概念即指出：「儒教是一種世界觀，一套社會倫理，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一個學術傳統，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註16〕除了緣於儒教價值適切封閉的農業社會形態之外，儒教之所以具有深廣的涵攝力，更在於成為封建帝王政體的擁護者後，透過階級教育和官僚等體制性網絡的滲透、發散，而成為一套涵括生活各層面價值之準則。因此，不論就政治層面、社會或文化層面，儒教的影響和形塑都是相當根本而深層的〔註17〕。

回到台灣近代小說的探討來看，「小說」發生和發展的幾個關鍵要素，也脫離不開儒教意識的影響。首先，就政治層面言。清代官方基於教化立場對通俗小說的禁絕，或許程度上對小說的傳播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基於清代對台灣消極治理之態度，可說清代官方對台灣小說發展並不具實質的影響。值得探究的，乃是日本殖民者對儒教，包括漢文／學的態度，以及殖民者這一態度、方針與近代台灣報刊小說發生之間的，政治文化與文學的關連性。

其次，作為小說實際存在、展演的場域，清代漢人移墾所形成的基本上

〔註14〕參閱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臺北市：臺灣學生，2007年）。

〔註15〕對於「儒學」、「儒家」、「儒教」三名詞意義上的分疏，筆者是援用陳來對此的定義：「一般講，『儒家』主要是強調作為一個學派的特性，儒家學派跟道家學派、跟墨家學派相區別，……『儒學』往往強調儒家學派裡學術體系的方面，因為儒家包括很多內容，比如政治、教化的實踐，……『儒教』的用法主要是在歷史上往往注重其作為一個教化體系的意義，……古代思想文化道德教化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各級各類的儒家的學者和組織來實現，當談到教化體系的時候，就用『儒教』的說法。」見陳來，《東亞儒學九論》（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178～179。

〔註16〕參見杜維明著、陳靜譯，《儒教 Confucianism》（台北市：麥田，2002年12月），頁38、39。

〔註17〕可參見李日章，〈儒家意理與台灣社會〉，張德麟編，《台灣漢文化之本土化》（台北市：前衛，2003年）。

是一儒教形態的社會。台灣移墾獨特的歷史與自然人文條件，勢必對小說的存在和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

最後，從接受和創作的角度來看，儒教文人士紳則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一、文人士紳不僅以讀者（就非書面的小說來說，即是觀賞者、聆聽者）的身分接受、傳播小說，也以創作者的身分，參與小說由非書面到書面形式的轉化進程，透過藝術的加工擴大和延續了小說的發展。第二、儒教意識對小說的制約，實際而言乃是通過文人士紳對小說接受的態度所實踐、表陳出來；在儒家經史詩文傳統教育下，文士對小說鄙薄卻又接受的心理，正是值得探究之處。第三、日本殖民初期，文人士紳的儒教價值和資本，不僅面臨伺應和轉化的情勢，更在這混雜、變異的文化氛圍裡，透過殖民報刊開始其小說創作，正式揭開近代台灣小說的帷幕，其間繁複的轉折與意涵，都繫連在文人士紳身上。因此，對於台灣小說的探究，近代台灣文人士紳階層的形成，以及其對殖民政權的反應情形，即是必要加以探討的要素。

總結上述，筆者此篇論文即欲以清末至日治初期（明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士紳在清代移墾儒教社會文化氛圍，以及對日治初期殖民政權儒教文化政策的應對這兩個政治、社會背景下，對小說的接受（主要指舊小說）和創作（報刊小說）作為研究中介，來探討儒教意識和近代台灣小說發生、發展的關係和影響。

架構上，論文概分四章。首章為緒論，主要陳述論文寫作的動機、思考進程及說明；次章為「移墾儒教社會的小說形塑」，主要探討清代台灣移墾的社會風尚與儒教文化意識對小說發展的影響，並具體考察小說的移墾社會傳播形態；第三章為「文人士紳的『在地性』與小說接受」，主要透過考察文人士紳的地方教化權力和實踐與其小說接受之關係，來探討儒教價值對小說發展的影響；末章為「殖民儒教的移植與近代台灣報刊小說的發生」，主要透過傳統文人對時局的肆應，以記者的身分進行報刊小說之創作，來探討在殖民者天皇國體儒教價值的移植和漢文文化統合的背景下，近代台灣報刊小說的發生內涵。論文最後以結論歸要各章闡述，總結以文人士紳的小說接受與報刊小說創作為主題的，一個儒教視角對台灣近代小說起源情形之考察。

第二章 移墾儒教社會的小說形塑

對於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建構，李國祁以「內地化」思維，來論釋清代台灣所形成的，乃是「與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會形態與文化」〔註1〕；陳其南則秉持「土著化」概念，論證在「祖籍人群械鬥由極盛而趨於減少，同時本地寺廟神的信仰則形成跨越祖籍人群的祭祀圈；宗族的活動則由前期以返唐山祭祖之方式漸變為在臺立祠獨立奉祠」的在地轉型後，清代台灣漢人將「在華南原居地的社會形態重新在臺灣建立起來」〔註2〕。由是可知，不論從哪一主體角度來審視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建構，其形態可說即是傳統中國封建社會的延伸，亦即是一以倫常道德為核心價值的儒教社會。

儒教社會象徵一個由儒教價值支配精神生活的社會形態，儒教意識不僅為人們提供價值觀念、思想模式及行為規範的導向，也對文化形態、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註3〕。本章節，我們即要探索清代台灣移墾社會的小說存在情形。透過探述移墾社會的性格、風尚和儒家教化價值觀，釐析清代台灣社會對小說發生和存在的影響。

第一節 移墾社會性格對小說發展的影響

一、重利豪奢風氣的形成

移墾本質的社會發展條件，對小說有著怎樣的影響？對於這個問題的思

〔註1〕 參見李國祁，《清代臺灣社會的轉型》（臺北市：教育部社會教育司，1978年）。

〔註2〕 參見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市：允晨文化，1987年）。

〔註3〕 參見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山東：山東人民，1990年3月），頁270～276。